



# 边境上的中国： 11 世纪以来广西中越 边境地区的历史与记忆

Frontier China: History and Memory in the Sino-Vietnamese  
Borderlands of Guangxi Since the Eleventh Century

杜树海 著



# 边境上的中国： 11 世纪以来广西中越 边境地区的历史与记忆

Frontier China: History and Memory in the Sino-Vietnamese  
Borderlands of Guangxi Since the Eleventh Century.

杜树海 著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边境上的中国：11世纪以来广西中越边境地区的历史与记忆 / 杜树海著. — 北京：九州出版社，2019.5  
ISBN 978-7-5108-9304-9

I. ①边… II. ①杜… III. ①边疆地区—地方史—研究—广西—古代 IV. ①K29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20)第129643号

## 边境上的中国：11世纪以来广西中越边境地区的历史与记忆

---

作 者 杜树海 著  
出版发行 九州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甲 35 号 (100037)  
发行电话 (010)68992190/3/5/6  
网 址 [www.jiuzhoupress.com](http://www.jiuzhoupress.com)  
电子信箱 [jiuzhou@jiuzhoupress.com](mailto:jiuzhou@jiuzhoupress.com)  
印 刷 北京九州迅驰传媒文化有限公司  
开 本 787 毫米 × 1092 毫米 16 开  
印 张 19.75  
字 数 340 千字  
版 次 2020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20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08-9304-9  
定 价 98.00 元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

## 出版说明

后期资助项目是国家社科基金设立的一类重要项目，旨在鼓励广大社科研究者潜心治学，支持基础研究多出优秀成果。它是经过严格评审，从接近完成的科研成果中遴选立项的。为扩大后期资助项目的影响，更好地推动学术发展，促进成果转化，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办公室按照“统一设计、统一标识、统一版式、形成系列”的总体要求，组织出版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成果。

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办公室

## 序

在有关边疆、族群的历史研究领域，似乎中古时期和北方地区总是占据了学者的大部分注意力，这并不奇怪。从现代学术史上看，自从被王国维称为“道咸之学新”的西北史地之学兴起，加上敦煌吐鲁番的发现，和西洋人、东洋人在我国西北、北方探险，更兼“二战”中陈寅恪预言的“吾国将来必循汉唐之轨辙，倾其全力经营西北”，即世局对学术的刺激，<sup>①</sup>有关中古时期北方胡、汉之区域与族群的研究，一直吸引着学界的目光。西方学者像拉铁摩尔、狄宇宙、巴菲尔德等，在讨论中国边疆和族群问题时，也大多聚焦在中古和北方。

不过，“近世”和“南方”也很重要。历史上，“中国”之所以成为“中国”，不止是秦汉以来，北方从“筑长城，界中国”逐渐到“长城两边是故乡”，也应当包括唐宋以后，南方的开疆拓土和改土归流，把过去被视为“蛮荒”或“化外”之地的南疆逐渐纳入版图。我过去曾说过，如果允许我们把中国大历史简化，也许可以说：“整个中国史大趋势，就是胡人从北方南下，压迫汉族，也逐渐‘汉化’，而汉族本身也逐渐‘胡化’；汉族在北方胡人压迫下，不断从中原南下，将南方逐渐‘汉化’，汉族本身在这一历史过程中也逐渐‘夷化’。”要包括北方的胡化/汉化，也要包括南方的汉化/夷化，这才是相对完整的大历史。

中国的“南方”或者说南方的“中国”，它的轮廓就是在近世逐渐清晰起来的。虽然正如拉铁摩尔所说：“古代帝国往往有边疆而无边界。”但近世以来，南方中国模糊的羁縻或作为缓冲区域的边疆，逐渐变成清晰的边界，确实是一个相当有意思的历史过程。杜树海博士的这部著作《边境上的中国——11世纪以来广西中越边境地区的历史与记忆》，就是叙述广西明代思明土司府、清代归顺州（今广西崇左、百色一带）从边疆到边界的这个历史过程。从他深入精细的研究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处于中越

<sup>①</sup> 陈寅恪：《朱延丰突厥通考序》，载氏著：《寒柳堂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第163页。

“之间”的区域和族群，在几百年间是如何经由来自中央帝国的军事征服，来自主流文化的教育渗透，以及当地土酋（即土著上层）争取政治权力的攀龙附凤，逐渐形成这一地区和族群明确的政治“归属”与文化“认同”的。

在这一边境形成的历史过程中，杜树海特别指出，南方中国这一区域并不像北方边疆，北方边疆往往既有族群的差异，又有游牧和农耕这种生产和生活方式的差异，思明土司府/归顺州这个区域，原本族群界限没有那么清晰，生活方式也相当趋同，只是在种种政治和文化的角力中，才逐渐分出了你、我，分属了两个国家。这个被杜树海称为“动态过程”的历史研究，不仅超越了过去单纯以现代国家边界画地为牢的“民族史”或“中外关系史”，也改变了过去从中原王朝视角，来观看边缘地带的“边疆史地”领域。特别是我前面所说的，这部著作和近来其他有关岭南和西南的若干著作一道（读者可以注意近三十年里，国内外有关岭南和西南历史研究著作的数量之多），改变了历史学界在边疆和族群历史研究中，“北重南轻”或“北多南少”的学术地图。

写这篇序，多少有些忐忑不安。为什么？因为我其实并不了解杜树海博士和他的研究领域，甚至我从来没有和他见过面。我想，更合适的序文作者应当是他在中山大学时的老师，即陈春声教授和刘志伟教授。我之所以答应来写这篇序文，只是缘于若干年前，全国百篇优秀博士论文评选中，我曾受命评审过他的博士论文。现在，杜树海博士把他的这篇博士论文修订增补出版，希望我给它写一篇序文，我想到最近正在思考的一些问题，刚好与杜树海博士的论著有某种联系，于是，这里我把一些想法简单地写出来，权当这部新著的序文，向杜树海博士和广大读者请教。



2018年6月28日

# 目 录

## 绪论

- 一、非生态边缘的华夏边缘····· 1
- 二、历史人类学的边缘研究方法····· 2
- 三、边疆、土司与身份认同····· 8
- 四、本书内容梗概····· 16

## 序篇 北宋侬智高起事与广西中越边境地区历史的转变

- 一、“国家”之间：侬智高起事前广源州土酋的动向····· 22
- 二、“国”灭之后：侬智高失败后帝国边缘的形势····· 31
- 三、“国界”初生？熙宁之战与“计议疆至”····· 38
- 小结：宋代的“中国”与宋代的“边境”····· 47

## 上篇 土司时代：明代思明府及其周边地区的考察

### 第一章 狄青奏授：宋末至明初土酋势力的动向

- 及其祖先叙事的创制····· 53
- 一、左、右江区域的“随狄征侬”祖先叙事及其起源····· 54
- 二、明江上游上思黄氏土酋的覆亡····· 60
- 三、宋末至元思明黄氏土酋的转向····· 66
- 四、明初思明黄氏土官的动向与祖先叙事的创制····· 73
- 小结：国家边界的地方意义····· 81

第二章 礼法之下：明中期的土司家族、边境形势与王朝势力·····	83
一、思明黄氏的衰落与“易储案”·····	84
二、明中期的土司纷争、明安关系与王朝礼法·····	91
三、争村夺峒：嘉隆时期王朝流官势力的扩张·····	103
小结：共同实践中的王朝国家·····	112
第三章 文武之道：明末清初王朝的文教、军事措施与	
思明土府的崩溃·····	114
一、万历年间思明府所属土州改属与土官动向·····	114
二、思明土府头目变乱与王朝流官势力的深入·····	121
三、清初的军事行动与思明土府的终结·····	129
小结：明清变迁与国家治理·····	140

## 下篇 改土归流：清代以降归顺州及其周边区域的考察

第一章 立废兴衰：清初之前区域网络中的归顺州岑氏土司·····	145
一、明初之前岑氏土酋的崛起与右江区域格局的奠定·····	145
二、地域、姻亲、家族关系与归顺州土司的兴衰·····	153
三、“挖窖案”与归顺州的改土归流及区域历史场景·····	161
小结：清初的资源、人员与信息流动·····	173
第二章 义士辟疆：官员、功名人士与归顺州文化面貌的建构·····	175
一、门户初开与外来官员对当地的经营·····	175
二、功名人士的出现与祖先谱系的编撰·····	184
三、功名人士崛起与地方历史的再造·····	196
四、人神之间：张天宗故事的构建过程·····	205
小结：再造祖先与地方历史·····	210
第三章 多层一统：归顺州故地民间信仰与仪式研究·····	212
一、功名人士传统的延续：靖西扶乩活动田野考察·····	212
二、多层一统：国家边缘地区民间信仰与仪式中的体系和层级·····	226
三、村落仪式与村落团结：靖西墨海屯“三月三”	
土地庙聚餐仪式考察·····	233
小结：从历史理解现实·····	236

## 结论：国家整合与多层一统

附录一 旧民慕归：钦州西部的地方历史与都峒之民	
祖先叙事的创制 .....	249
一、“马留人”黄氏的祖先叙事及其分析：以族谱为中心 .....	250
二、宋至明中期钦州西部的社会历史变迁 .....	252
三、嘉靖年间知州林希元与都峒之民祖先叙事的创制 .....	262
附录二 家国之间：中越边境地区沿海族群之身份与	
认同的历史考察 .....	274
一、沿海族群豪丫黄氏祖先记忆的歧异性 .....	274
二、动荡的社会、模糊的身份：明末至清沿海居民之历史描写 .....	276
三、文化与权力：豪丫黄氏“身份”的转换及其意义 .....	282
地名索引 .....	290
征引文献 .....	292
后 记 .....	304

# 绪 论

## 一、非生态边缘的华夏边缘

本书研究的区域大致为：今广西崇左市宁明县（明代的思明土府核心区）、百色靖西市（清代的归顺州地域）。其中，宁明县位于左江上游明江流域，靖西市则处于左、右江上游的分水区域，两地均处中国、越南边境地带。在宋代，这一带属于广南西路邕州管下羁縻州县与溪峒，元代两地分属思明路、镇安路，明代两地分属思明府黄氏土司与归顺州岑氏土司，清雍正间两地得到改土归流。在本书附录二中，还将考察中越边境沿海地带防城港市，其属明清时期广东廉州府钦州的西部地区。钦州在宋代归属广南西路，解放后重新划归广西壮族自治区。从靖西到宁明再到防城港一线，完整囊括了中国广西与越南的边境地带。

湿热的气候、肥沃的土壤以及众多的溪流，使得广西左、右江流域成为人类早期居住的区域之一。古人类遗址、左江岩画以及发达的稻作农业便是明证。这里有肥沃的土地，但它们却不同于中原地区的一马平川。水田一般为四周的石山所环绕，聚落则围田居于山下，当地人称这样的人地组合为“峒”<sup>①</sup>。

历史上，这里的人群被称为“蛮”“峒民”“狼”“僮”等，当今他们被识别为中国人口最多的少数民族——壮族。中越边境一线是壮族分布最集中的区域，以广西靖西市为例，当地壮族人口占总人口的99%以上，是最为典型的壮族聚居县。在防城港沿海一带则分布着与越南主体民族——越族具有渊源关系的京族，其也是中国人口最少的少数民族之一。

<sup>①</sup> “峒”，又写作“洞”“崗”。黄家信认为，峒是传统壮族社会的基本单元，并着重分析了其经济生态基础。参见黄家信：《壮族地区土司制度与改土归流研究》，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2007，第56页。

在民族国家框架下的广西地方史书写，较多关注郡县制度、文教推行及汉族移民等课题，其目的在于强调广西区域与中原地区的同质性。来自考古学、民族学等学科的研究，则反映出广西（特别是广西南部区域）与东南亚地区在史前文化、生计方式、族群文化等方面的相似性，比如铜鼓文化、“那”（稻作）文化、语言文化等。当下民族学界、人类学界多将对广西南部、越南北部一带人群的研究视为不同“民族”之间的比较研究，对区域的历时性发展演化不够关注，亦即对“国境”“边界”的动态建构关注不够。

在唐代及之前，中国与越南（交趾）是连成一体的，相当于今越南国的地区（隋唐时期今越南中、北部）是中华帝国疆域的一部分。唐末，越南逐渐走向独立自主，中国与越南的分化及广西区域的边疆化也随之发生。

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台湾学者王明珂提出的“华夏边缘说”引起学界重视。王认为，华夏边缘的根基在于这些区域已达华夏能生存的生态极限，亦即农耕与游牧的界限。但笔者认为，在中国南方却明显不存在这样的天然界限。因此，在这样一个非“生态边缘”的华夏边缘讨论国家、族群的分化、整合，以及地方社会的变迁，是一项新的、有意义的课题。

总之，全书主要围绕下列问题进行展开（当然并不仅限于此）：宋朝时期，这个区域的人群如何理解、看待“中国”？宋至明初，当地土酋势力发生了怎样的分化？明朝时期，在所谓的“土司制度”之下，当地人面临何种意识形态以及他们有何应对策略？清朝时期，此区域的基层社会和文化面貌发生了什么变化以及深层原因为何？当下，地方社会的信仰与仪式有什么特点？体现了何种象征与隐喻？最后，笔者总结了国家整合的方式问题及其地方意义，这不仅是一个历史学的问题，更是一个社会科学的问题。

## 二、历史人类学的边缘研究方法

“在阐述民族或族群的历史根源性时，我们过去采用的溯源式叙事范式，恰恰忽略了对于所研究对象的主观归属意识之状况及其历史变迁进行必要的考察，因此便可能很轻率地将某种经过极漫长的历史变化过程才最

终形成的结果，非历史地倒追到该过程的开端之时。”<sup>①</sup>姚大力如此评述中国边疆史研究的问题与不足。

在笔者看来，这特别体现在针对“历史上中国的范围”这一问题的讨论上，即许多学者汲汲于寻找一条一以贯之、亘古有效的中国“边界”。据邢玉林于2001年所作的综述，关于这个问题，以往大致有以下五种意见：一是以鸦片战争以前清朝的版图作为历史上中国疆域的范围；二是以今天的中国版图作为历史上中国疆域的范围；三是以历史上不同时期形成的统一多民族国家的疆域作为历史上中国疆域的范围；四是以接受了汉族文化或儒家文化的地区作为中原王朝的疆域，即以文化标准来判断疆域的范围；五是以汉族建立的王朝的版图作为历史上中国疆域的范围。谭其骧、白寿彝、周伟洲是前三种观点的提出者，第四种意见近十多年来很少听到了，最后一种意见已销声匿迹，绝大多数学者持第一种意见。<sup>②</sup>

2002年，赵永春提出的新意见是：“凡是生活在今天中国疆域内的民族以及历史上生活在今天疆域内而今天已经消失了的民族都是中华民族的组成部分，他们的历史（外来民族迁入之前的历史另作别论）都是中国历史的组成部分，他们在历史上活动的地区及其建立政权的疆域也都是中国历史上疆域的组成部分。”<sup>③</sup>

于逢春在2006年提出，应将中国疆域最终奠定的空间坐标判定在1820年的《嘉庆重修大清一统志》及其所附“皇舆全图”所确定的领域，并进一步提出：“1820年的清朝疆域，既是中国疆域范围的最终底定极点，也是东西方力量对比最终逆转的临界点，更是中国国势由强转弱的最后时刻。”<sup>④</sup>

这场讨论由谭其骧所引导，或许透露出其有着某种现实操作方面的考虑，即制作中国历史地图的需要。但是，从谭先生本人主持编绘的中国各朝代历史地图来看，争论这样一条中国“边界”的意义并不大，因为这条界线是不断变动的。

本书试图走出上述“溯源式”边疆史研究范式。笔者认为，与其争论

① 姚大力：《西方中国研究的“边疆范式”：一篇书目式述评》，《文汇报》2007年5月7日，第6版。

② 邢玉林：《1989年—1998年中国古代疆域理论问题研究综述》，《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1年第1期，第1页。

③ 赵永春：《关于中国历史上疆域问题的几点认识》，《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2年第3期，第1页。

④ 于逢春：《论中国疆域最终奠定的时空坐标》，《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6年第1期，第1页。

何时、何种的中国王朝疆域（国家边界）能够代表历史上的中国疆域（边界），不如将之完全视为动态建构的过程。相较以往边疆史领域较为静态的“定点”“定位”研究，本书强调边疆、国家的动态建构性；相较全国层面的整体研究与宏观理论研究，本书坚持在详尽的细部个案基础上，再作理论的探索、总结；相较从王朝国家（皇帝、大臣）的视角出发，关注疆域的范围、边疆的经略，本书强调从边缘看中心，关注边缘人群的主体性与能动性，发掘他们在边疆、国家建构中的能量与作用。在“民族国家”观念深入人心的今天，“边界圈定人群”变得习以为常，但回到历史，“人群如何塑造边界”尤应值得重视。

边疆、边界既是国家的，也是地方的，皇帝、大臣关注自身统治范围，自有国家威严、资源获取、人力控制等方面的理由；但是地方人群恐怕更为关心、重视这条边界，因为他们就生于兹长于兹，事关他们的切身利益。于明清时代而言，王朝国家“有边无界”的说法并不完全成立。当然，地方人群对这条界线的感知不一定与国家层面的看法完全一致。总之，国家边界的地方意义将是本书重点考察的一个概念。

遵循前述研究取向的导引，本书提出“国家整合”概念，并将从地方人群的行动实践与主观认同视角切入，而非传统研究关注的国家建置、军事部署与文教推广等。当然，笔者的目的并非单纯研究“地方”，而是在“地方”做研究。地方（民族）文化“实体论”以及与之相关的地方（民族）文化“中心主义”都应适当地“去实体化”与“去中心化”。笔者以为，地方（民族）文化是在不同时间段内经由不同文化传统层叠而成的，“土著”“外来”等概念只有在相互比较的语境之下才有意义。在地方（民族）文化的体系与层级里面，存在一统性的力量。这就是本书将要论述的“多层一统”概念。

在西方学界，研究中国（特别是西南）边疆史、民族史的论著长期为“汉化”“殖民化”两种范式所主导，其中，“汉化”范式强调的是汉族南向移民带来文化同化，而“殖民化”范式则把明清王朝与西方历史上的殖民帝国进行类比，强调的是殖民征服和殖民技术。<sup>①</sup>很显然，笔者上述的研究取向也与其大为不同。

<sup>①</sup> 邹立波认为，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殖民”概念的应用是美国“新清史”学者在涉及中国边疆、族群和“征服王朝”等问题时，受后殖民理论影响，过分强调“去汉化”“去中心化”的后设之见；而西南边疆史研究对“殖民”概念的采纳则是其翻版。详见邹立波、李沛容：《西南边疆在明清史研究中的地位——美国现代学术视野下的中国西南边疆史研究》，《思想战线》2013年第6期。

在具体研究方法上，本书主要运用历史学的文献研究方法与人类学的田野研究方法，借鉴人类学的文化、族群、边界、宗族与民间信仰诸理论，以及历史学的历史记忆理论、政治学的国家理论等，构成综合的跨学科研究方法。

在历史文献研究方面，注重中外史料相结合，考证、分析两者的异同及其形成原因，撷取史料中的细节进行分析论述；注重官方史料与民间史料相结合，考察两者的相互关联性及歧异性，揭示地方社会的复杂历史面貌。在史料解读中关注制度、意识形态与人的互动性，即人如何塑造制度及意识形态，然而又为其所笼罩与规训。

在实地田野研究方面，注重文献收集与仪式观察相结合，在大量收集民族民间文献（如家乘谱牒、石刻碑文、宗教文书、传说故事等）的基础上，进行长期跟踪的仪式观察，并坚持“在田野里读文献”和“带着文献做田野”，以求真实重现地方的历史场景，深入分析人群的行为心态；用具有历史深度的眼光观察地方文化景观，解析层层叠叠形成的地方文化传统。

总之，前述研究取向大概可以归纳到历史人类学的地域研究方法里面，而萧凤霞、刘志伟提出的“结构过程”（structuring）概念，则为这种方法作出了哲学层面的说明：

我们一直以来往往不必要地把“结构”和“变迁”这两个概念截然二分，实际上，我们要明白“个人”在分析研究中所发挥的“作用”，要了解的并不是“结构”（structure），而是“结构过程”（structuring）。个人透过他们有目的的行动，织造了关系和意义（结构）的网络，这网络又进一步帮助或限制他们做出某些行动；这是一个永无止境的过程。<sup>①</sup>

具体就族群、边疆议题而言，萧、刘的见解也为本书的研究提供了重要指引：

在珠江三角洲的田野经验也让我们意识到，疍民的身份并非一个僵化的标记。……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我们的兴趣在于考察“汉”或“疍”的标签如何在具体的社会文化历史过程中被制造出来，并在人

① 刘志伟：《地域社会与文化的结构过程——珠江三角洲研究的历史学与人类学对话》，《历史研究》2003年第1期，第54页。

们头脑里凝固起来？地方权势以什么手段去将一些模糊的社会界线用一些僵化的身份特征把不同的群体清楚区分开来，最终设定了这些僵化的社会身份的原旨？另一方面，被歧视的群体又用什么文化手段绕过障碍去改变自己的身份？王朝制度的运作有没有提供讨价还价的空间？

我们如果尝试摆脱这一模式（指汉化模式——笔者注）的框框，提出另一视角，就不妨把帝国视为一个文化的观念，教化的过程不是通过自上而下强令推行的，而是本地人自下而上利用国家秩序的语言，在地方社会中运用以提升自己的地位。……如果国家建造的过程是包含着本地人如何用自己的办法去将自己同中心联系起来，我们与其将“边疆”视为一个承受国家制度扩张的开放空间，不如更多地关注地方上的人们如何运用他们的创意和能量建立自己的身份认同。<sup>①</sup>

如何在看似清晰的身份界线与貌似整齐的制度框架下，观察地方人群的能动建构，正是本书努力探索的方向。

论及地域研究方法，就不得不提及科大卫的“地方社会模式”理论。他曾写道：“地方社会的模式，源于地方归纳在国家制度里面的过程。国家扩张所用、地方社会接纳的理论，就是地方社会模式的根据。循这一方面来走，我们了解一个地区的社会模式，需要问两个问题：一个是这个地方什么时候归纳在国家制度的范围？第二，归纳到国家范畴的时候，双方是应用什么办法？”<sup>②</sup>科大卫还用莆田平原与珠江三角洲的地域比较来说明他的理论。莆田与珠江三角洲分别是在南宋与明代得到中央王朝的重视，并进行大力开发的。两地的分别也就在这里，南宋把地方归纳到国家的办法跟明代不同。南宋应用的办法，是朝廷承认地方神祇。明代的办法，开始是里甲，后来是宗族礼仪。所以，珠江三角洲的村落，明显地受到以家庙式的建筑物为核心的活动的领导，而在莆田，不是宗族没有兴起，而是宗族制度只是加在一个既有的神祇拜祭制度上面。“地方社会模式”理论可谓“华南研究”为学术界做出的最重要理论贡献，它的研究对象虽然在于地方，但最终落脚点则在于解释整个中国的历史与文化。之所以称其为“理论”，是因为它能为所有从事中国研究的学者提供借鉴，其他学者在从

① 刘志伟：《地域社会与文化的结构过程——珠江三角洲研究的历史学与人类学对话》，《历史研究》2003年第1期，第63页。

② 科大卫：《告别华南研究》，载华南研究会编辑委员会编：《学步与超越：华南研究会论文集》，（香港）文化创造出版社，2004，第29页。

事不同地域、主题的研究时可以检验、修正这套理论。

沿袭上述研究理路的两部“西南研究”作品，为本书的撰写提供了有益的参考与借鉴。一是连瑞枝的《隐藏的祖先——妙香国的传说与社会》，一是温春来的《从“异域”到“旧疆”——宋至清贵州西北部地区的制度、开发与认同》。连书是一本以“土著观点”（native point of view）撰写而成的历史作品。作者透过云南大理区域史的研究，揭示“前中国帝制”时期边陲地区多元文化的历史景深，用丰富的地方文献勾勒了明帝国进入云南前的南诏大理国人群如何透过虚拟的祖源传说、联姻关系与佛教经典正统，建立了以多元社群为基础的社会。<sup>①</sup>连书研究“前帝制时期”的地方社会，无论是在研究方法上，还是在研究结论上，都为笔者理解本书研究区域在宋代的历史以及地方传统在后世的延续提供了有益借鉴。

温书为一本在区域社会史或历史人类学风格影响下的政治史或制度史的著作。作者通过叙述宋至清黔西北的历史演变，概括黔西北这样一个具有某种典型性的非汉族社会，在制度、经济、文化、认同等方面逐渐与内地紧密整合在一起的复杂历程。<sup>②</sup>尽管本书处理的区域较为特殊，它处于一种三方——地方人群、中原王朝、安南王朝——关系之中，但温书从制度、开发、认同等角度研究传统中国社会整合问题的思路，仍为本书提供了重要参考。

除了上述历史人类学的学术脉络，思想史家葛兆光有关重建“中国”历史叙述的著述，则为笔者开拓了历史视野的宽度与深度。葛倡导从周边看中国，主张把中国放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国际”环境中加以观察。具体来说，这种“国际”环境包括：明清时期的日本、朝鲜、安南—中国，以及宋代的西夏、辽—宋。此外，葛还主张在历史中理解民族国家，提出中国在宋代即出现民族主义（民族国家）的“远源”，并从“国境”“爱国主义”以及“华夷”意识等方面加以论述。<sup>③</sup>传统中国与当下中国、中国古代史与近当代史不是完全断裂的，不必截然两分，两者之间可以相互对照、镜鉴，这是笔者从葛著得到的启示。葛将中国民族主义（民族国家）的远源追溯到宋代，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总之，葛的观点为本书提供的宏观视野与理论借鉴，主要体现在本书对宋代、明代中国的一些整体看法方面。

① 参见连瑞枝：《隐藏的祖先——妙香国的传说与社会》，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

② 参见温春来：《从“异域”到“旧疆”——宋至清贵州西北部地区的制度、开发与认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第9页。

③ 详见葛兆光：《宅兹中国：重建有关“中国”的历史论述》，中华书局，2011。

当然，笔者在书中也多次强调，应该注意历史中国的复杂性与多面性，宏观层面的观点必须接受史实的修正。

北方民族史研究领域近年来的新进展也是本书的重要镜鉴，其中主要是“内亚研究”与“新清史”的若干重要观点。<sup>①</sup> 笔者的感悟与体会主要有以下三点：一、历史上周边族群传统的同质性与连续性应该引起足够重视；二、中原王朝并非想象中的万世一系、铁板一块，周边在变，中心亦在变。中原王朝在不同历史时期具有阶段性与特殊性，笔者尝试谓之“王朝的族群性”；三、中心与周边的历史不是截然分裂的，而是相互影响、相互叠加的。所以，笔者前文提出的“从边缘看中心”，其实是有强调的意味，更为真实的意思应该是：只有两者互看，才能更加贴近真实，而不会失之偏颇。

### 三、边疆、土司与身份认同

与本研究密切相关的前人研究成果主要分布在三个领域：中国边疆通史领域，壮族土司研究领域，以及壮族身份、认同研究领域。

在中国边疆通史领域，民国时期的知名学者顾颉刚等人就开始倡导“边政学”研究，为这个领域的研究打下良好基础。1949年之后，边疆通史研究仍旧延续民国时期“边疆沿革史”“边疆政策史”“边疆开发、经略史”传统。其代表性成果有：刘宏焯《中国疆域史》<sup>②</sup>，“中国边疆通史丛书”<sup>③</sup>（如《东北通史》《北疆通史》《西域通史》《西藏通史》《西南通史》等），马大正主编的《中国古代边疆政策研究》<sup>④</sup>《中国边疆经略史》<sup>⑤</sup>，等等。

在边疆地区，明清两代广泛盛行土司统治。1949年以后至20世纪90年代，关于广西土司的研究是纯粹的“制度史”风格，即把土司现象简单地看成王朝国家统治制度在边缘地带的延伸，而对其进行制度条文的考辨

① 此处略举两本著作作为代表，一、罗新：《黑毡上的北魏皇帝》，海豚出版社，2014；二、Mark C. Elliott, *The Manchu Way: The Eight Banners and Ethnic Ident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② 刘宏焯：《中国疆域史》，武汉出版社，1995。

③ “中国边疆通史丛书”由中州古籍出版社分别于2002年、2003年出版。

④ 马大正：《中国古代边疆政策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

⑤ 马大正：《中国边疆经略史》，中州古籍出版社，2000。